

中美边际消费倾向比较

- 1. 案例名称：**中美边际消费倾向比较
- 2. 案例适用：**国民收入决定理论
- 3. 运用知识点：**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、边际消费倾向、消费函数、生命周期理论、预防性储蓄
- 4. 案例内容：**

边际消费倾向（MPC）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，指居民每增加一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。这一指标不仅反映居民的消费意愿，更是衡量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标尺。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，其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长期备受关注。

根据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及其团队的研究，通过 2000 年至 2024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，目前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 66% 左右，而同时期美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接近 88%。这意味着，中国人每增加 100 元可支配收入，约有 66 元用于消费，剩余 34 元存入银行；而美国人每增加 100 元收入，则有 88 元用于消费，仅 12 元用于储蓄。

这一差异并非短期现象，而是反映了两国消费模式的结构特征。回顾历史可以发现，美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过去数十年中并非稳定不变，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波动。例如，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美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，与当时美国通胀压力和财政紧缩有关；20 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，在经济繁荣与资产效应带动下，美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逐步攀升；近年来，尤其是疫情后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增强，美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回升趋势。美国经验表明，边际消费倾向具有较强的政策响应性。

从消费率来看，中美差距同样显著。2024 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为 39.9%，较美国低 28 个百分点。其中，商品消费率两国大致相当，差异主要源于服务消费——中国服务消费占 GDP 比重为 18.4%，美国则高达 46.5%，相差 28.1 个百分点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，中国现阶段的消费不足主要是服务消费不足，这是结构性的而非边际性的。

从实物消费量看，差距有所缩小。剔除价格因素后，中国居民平均实物消费总量可能接近美国的 164%，人均实物消费量约为美国的 41%。但服务消费方面，中国人均服务消费量仅约为美国的 21%，其中娱乐文化等精神性消费领域更是仅为美国的 10%。中国人均观影次数、旅游次数和住房面积大致处于美国的 40% 至 60% 区间。

为什么中美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如此大的差距？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给出了解释。

第一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不同。回归分析显示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对最终消费率的系数为 0.64，表明社保完善有助于提高消费率。中国养老金规模占 GDP 比重约为 10%，而日本这一数字为 74%。社保体系水平上不去，居民对未来医疗、养老等支出存在较强不确定性，只能增加预防性储蓄，抑制当期消费。

第二，收入分配格局的差异。回归结果表明，基尼系数对最终消费率的系数为 -1.69，在 1% 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，说明收入不平等会显著抑制消费。中国有 4 亿中等收入群体，其下还有约 9 亿低收入群体，这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虽高，但收入水平有限，难以形成有效消费需求。

第三，消费观念的差异。美国消费模式基于全民负债，居民储蓄率常年仅4%至5%，消费信贷余额高达4.8万亿美元，人均约1.5万美元。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，2023年达43%，消费观念偏向“量入为出”和储蓄防老，人均消费贷款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。

第四，城乡结构的差异。根据2000年至2024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，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86%，显著高于城镇居民的55%。这说明农村居民在获得新增收入后的消费意愿更强，但其收入水平偏低，制约了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提升。

5. 案例分析：

本案例通过中美边际消费倾向的比较，生动展示了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在现实中的具体应用，以及影响消费行为的深层次因素。

首先，边际消费倾向是理解国民收入决定的关键变量。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，居民当前消费主要受当前收入水平影响。中美两国MPC的显著差异，直接决定了两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不同路径。中国的66%与美国88%的差距，意味着同样规模的新增收入，美国能够产生更大的消费需求扩张效应。以乘数效应计算，中国的乘数约为2.94（ $1/(1-0.66)$ ），美国约为8.33（ $1/(1-0.88)$ ），美国财政刺激的效果远高于中国。

其次，生命周期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为理解MPC差异提供了理论支撑。生命周期理论强调，消费取决于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收入预期及未来保障机制。美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从而敢于消费；中国社保体系尚在完善过程中，居民不得不为养老、医疗、教育等大额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，这直接拉低了边际消费倾向。

第三，服务消费占比偏低是导致中国整体消费率低于美国的重要原因。刘世锦指出，服务消费较多依赖于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，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。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66%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48.3%，大量人口难以享受到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，这直接制约了发展型消费的增长。服务消费不仅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还因其与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高频次、高附加值需求紧密相关，具备更强的乘数效应。

第四，边际消费倾向的结构性差异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精准靶点。中国农村居民的MPC高达86%，远高于城镇居民的55%，这意味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能够带来更大的消费拉动效应。同时，服务消费占比若从当前的43%提升至53%，未来5年可新增约14.9万亿元消费需求。这些结构性特征提示，扩大内需需要从边际消费倾向提升、服务消费扩容、农村居民增收等多路径协同发力。

第五，美国的消费模式虽有借鉴意义，但需辩证看待。美国消费力的繁荣本质上由全民负债、贫富差距、美元霸权及政策刺激共同支撑，具有透支未来的特征。美联储加息已导致居民负债压力陡增，信用卡违约率飙升，消费被迫缩减。中国消费力虽当前规模不及美国，但由居民实际收入支撑，更为稳健和可持续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边际消费倾向并非一成不变。美国经验表明，通过完善社会保障、改善收入分配、增强居民收入预期，可以有效提升MPC。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“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”，正是希望通过制度性设计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。

6. 案例讨论：

(1) 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（86%）远高于城镇居民（55%），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。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，会采取哪些措施释放农村消费潜力？这些措施与提升城镇居民消费的措施有何不同？

(2) 美国消费模式建立在全民负债和高消费信贷的基础上，而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处于高位。两种模式各自的优势和风险是什么？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，哪种模式更具可持续性？